

本报讯(记者 徐健) 为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由中国文联、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电视台主办的“党的旗帜高高飘扬”系列音乐会将于7月12日至15日在国家大剧院歌剧院上演。演出汇集了老中青百余位歌唱艺术家将在4天的演出中陆续登台。音乐会的曲目设置则精选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经典音乐作品,如《我的祖国》《映山红》《红星照我去战斗》《我爱你中国》《复兴之歌》等。这些作品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团结民众、鼓舞士气、取得解放和建设事业的胜利等方面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此外,交响合唱作品《在祖国的怀抱里·西北天》、钢琴协奏曲《长江》等新创作作品也将精

彩亮相。主办方表示,在党的十八大即将召开的前夕集中展示这些经典作品,是对党的社会主义文艺建设成果的一次展示和检阅,将起到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积极作用,也将为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营造喜庆和谐的良好氛围。

本次演出的视觉团队采用了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班底。演出总导演王冼平表示,将通过本次演出对国家大剧院的高精尖舞台设施进行一次最大限度的“挖掘”,对舞台的纵深、空间都进行充分的利用,制造出惊艳的视觉效果。

专家学者研讨报告文学《三牛风波》

展现新一代的青春风貌和进取精神

本报讯(记者 王冕) 何建明的报告文学新作《三牛风波》近期出版后,引起各方关注和好评。6月29日,由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文艺报社和作家出版社主办的《三牛风波》作品研讨会在京举行。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书记、该书作者何建明,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李敬泽,中组部办公厅副主任张明平,《文艺报》总编辑阎晶明,作家出版社总编辑张陵,共青团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万速成,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史宗恺,中共甘肃武威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明生等出席研讨。研讨会由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副主任梁鸿鹰主持。

2012年春节前夕,甘肃武威的一次“公选”通过网络传播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广泛关注。对仅有半年工作经历,23岁即当选受聘副县级领导职务的焦三牛等几名清华学子,社会公众和舆论发出了各种各样的声音,引发了一场“风波”。出于作家的职业敏感和社会责任感,何建明试图找出真相、探明究竟,并从这场“风波”中挖掘出深刻的社会文化内容,这就是《三牛风波》的最初创作动机。通过实地调

查采访,何建明不仅揭开了事件的真相,还逐步走进了焦三牛、蔡程程等基层青年干部的生活和内心,深受感动和触动。他深深感受到,焦三牛等是一群有理想、有抱负的“80后”青年,他们坚定地选择到国家最需要的西部去,从基层干起,并为改变西部贫穷落后的面貌而努力工作着。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一个青春中国美好而富有希望的未来。因此,作品已不仅是单纯回应公众的质疑,还表达了作者对当代人才成长新理念的思考。

谈及这部作品,何建明感慨良多。他说,《三牛风波》的采访写作只有很紧张的一个月时间,在这个过程中自己学习收获了很多,也有着很深的感受和启发。报告文学工作者可以也应该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和社会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在各行各业的工作岗位上迅速成长,他们中有不少人选择去西部地区奉献自己的青春和力量,令人感佩。如果有更多的年轻人看过这本书之后选择投身西部、扎根基层,这对自己而言无疑是最大的欣慰。张明平、万速成、史宗恺等也表示,《三牛风波》对今后的

实际工作具有积极启示意义。有关方面将不断积极探索新途径、新方式,进一步做好人才培养输送和年轻干部选拔任用等工作。

李敬泽说,《三牛风波》体现了报告文学的思想性,也是研究和分析报告文学艺术如何体现其思想品格的一个范本。网上的这样一场“风波”,考验的不仅是作家认清事实、表现事实的能力,还包括作家的思想能力,即在论辩中如何通过说理达到较高思想层面的能力。现在的报告文学作品有时缺乏一种讨论、对话、探索的气质,在现在这样一个网络时代,更需要一种平和、理性、冷静、富有建设性的思想品质以及相应的表达与书写。《三牛风波》正是体现了这样一种可贵的理性和建设性。同时,作品在报告文学如何塑造人、刻画人、表达人物的精神风貌等方面也提供了很多启示。

李明生谈到,《三牛风波》以凝练厚重的文笔和大量鲜活的事例生动诠释了“三牛精神”——即肩负重大责任的崇高境界、奉献艰苦地区的坚定志向、扎根基层的创业精神、经受实践磨炼的优秀品质。“焦三牛们”的选择折射出了当代青年建设国家的光荣使命感和神

圣责任感,这也是他们人生价值和远大抱负的完美统一。这部作品将激发当代青年更加强烈的责任感,营造有利于青年干部成长的环境。

与会专家学者谈到,《三牛风波》通过对焦三牛等一批毕业于名校却选择投身西部的青年干部的刻画,展现了新的社会环境下人才成长道路的新理念、新探索,既回应网络的质疑,更回应现实的挑战。作家敏锐地发现并塑造了具有典型代表性的“焦三牛们”的形象,展现了他们光彩照人的青春活力和青年精神,让人们认识到“80后”这个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积极上进勇于创新的庞大群体有了更多认识和理解,体现出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和忧患意识,为引导青年人培养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敬业观和树立良好社会风气作出了独特贡献。作品把清华大学和武威共同创造的人才建设、干部培养的经验放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讲述,发人深省。在现代传媒日趋多样化、各种质疑时有出现的今天,这部作品还具有重建信任的延伸性意义,彰显出报告文学的公信力。作品的开篇并不大,但随着作家笔墨的层层递进,可以引发人们对各种社会问题的思考,具有很强的内在张力。这是一部直面当下矛盾、及时回应现实、坚持“三贴近”、反映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的优秀主旋律作品。

参加研讨会的还有雷达、何西来、胡平、包明德、李炳银、汪守德、施战军、吴义勤、王必胜、白烨、孟繁华、胡殷红、张颐武、张水木、应红、刘方、荆德刚、徐忠志、李朝全、叶延禄、张生兴等。

本报讯 由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发布的《中国文情报告(2011-2012)》近日正式“出炉”。自2003年起的9年间,这一系列关于中国文情的宏观考察报告已连续出版了9种。在文化环境日益复杂的当下,《中国文情报告》已经成为概要了解文学与文坛的“必读”书目。

这部“文学蓝皮书”由白烨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课题组成员包括贺绍俊、李朝全、陈福民、陶庆梅、马季、王冰等。该书针对2011年中国文学与文坛的发展与走向、现象与成果、经验与问题等进行了细致的扫描,总结出年度文学的宏观走向,及其发展演进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中国文情报告》指出,从创作所呈现的局面来看,以文学期刊为阵地的传型文学在守望中继续坚持;以市场运作为手段的市场化文学在寻索中不断铺展;以网络传媒为平台的新媒体文学在分化中强势繁衍。面对这种“丰繁多样”的文学现状,该书课题组进行了力所能及的观察和梳理。

《中国文情报告》还对一些文学领域的焦点性现象和倾向性问题进行捕捉与评说,如长篇与中短篇小说的生产失衡、文学阅读中的浅俗化走向等。该书指出,从2011年文学诸方面的表现来看,当下的文学与文化呈现出“很难一言以蔽之”的纷繁现状,这是文学、文化内部与社会、时代外部的多种因素合力构成的。置身于这样一个全新的环境,文学工作者无疑任重而道远。

在日前举行的《中国文情报告》研讨会上,专家对该课题组的工作成果给予肯定,并提出了建议。(黎 华)

向劳动和劳动者倾注更大热情

梁鸿鹰

有天晚上,无意中看到东方卫视一档节目——《劳动最光荣》,这让昏昏欲睡、不停按着遥控器的我眼前一亮,是啊,“劳动最光荣”!多好的题目,多好的创意。东方卫视作为大都市的强力媒体,认真聚焦最普通的一线劳动者,把镜头对准那些默默无闻的百业高手,展示在那些平凡的工作岗位上怀有非凡梦想的人们的技艺、智慧,讲述劳动者自己在劳动中绽放的荣耀,从而向广袤大地上那些勤劳、诚实、深具创新能力的新时代辛勤劳动者致意,真的提神、给力。我不禁为这档节目叫好。

劳动使人类获得生存的可能、生命的延续,使人类收获天堂与幸福。我们不但从劳动中获得物质财富,而且也得到精神财富,不少伟人都表达过这样的意思——只有人的劳动才是神圣的,世界上所有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由人的聪明的手创造出来的。而且,正像马克思说过的那样:“体力劳动是防止一切社会病毒的伟大的消毒剂。”劳动可以减少恶行,劳动是世界上一切欢乐和一切美好事情的源泉。

我们也有充分理由说,这样的一切欢乐和一切美好事情的源泉,同样应该与文学创作密切相关,成为文学创造的源泉。综观中国文学发展史,对劳动的珍视、对劳动创造者的咏叹,历来就是一个浩大的传统。人们看到,从白居易、杜甫,到鲁迅、艾青、赵树理,历代诗人、作家都从不同角度展示过走近劳动者的感悟,描写过劳动者的坚韧、艰辛与充实。李大钊说过:“我觉得人生求乐的方法,最好莫过于尊重劳动。一切乐境,都可由劳动得来,一切苦境,都可由劳动解脱”。劳动、创造、收获,总是能够唤起有良知的作家们充沛的激情,引发他们内心深刻的冲动,也涌现出最强劲、持久的灵感。那些关于劳动、创造、积累的书写,关于劳动者、创造者的吟唱,总是能够有助于人们告别慵懒,获得安宁与净化,也能赢得广泛的反响和真诚的共鸣。

文学史上的伟大作家,同样对劳动心存敬畏,并且以笔为犁,身体力行、勤奋耕耘,在笔耕的劳作中升华着对生活、对世界的认识,增强着对劳动和劳动者的关怀。异常激赏契诃夫的高尔基认为,自己还从来没有见过像契诃夫这样对劳动的意义理解得那么深刻、全面,进而真正把劳动视为文明基础的人。他说契诃夫“喜欢修建花园,培植花圃,美化土地,他感到了劳动的诗意图。他怀着令人感动的心情观察他栽在园里的果树,欣赏他培植的灌木”。“如果每一个人在自己那块土地上做出能够做的一切,那么我们的祖国该有多美!”众所周知,契诃夫身体很不好,一辈子疾病缠身,但他从来没有懒惰过,从来没有表现过对劳动者的疏离。他从莫斯科迁到梅里霍沃村,走到普通民众中去,帮他们修路、办学,给劳动者治病、扶平霍乱、救济饥民,他的作品倾注了对劳动的热爱、对劳动的感情。我们连一个最需要劳动创造的时代,让我们向他看齐,向劳动和劳动者倾注更大热情吧!这是时代的呼唤,也是文学的使命。

文艺观象

“小说需要更多的审美意外”

——访作家鲁敏

□本报记者 武翩翩

鲁敏的作品,并不以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取胜。她的文字细腻、精致,恰如一块针法讲究、色彩清雅的苏绣。近日,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推出了这位江苏女作家历时3年潜心完成的长篇小说《六人晚餐》。作品讲述了两个单亲家庭六位主人公的艰难与分合,以及他们在这个“唯成功论”年代中的困境与突破。故事所蕴含的社会问题和大众情绪,使得不少读者“心有戚戚焉”。

6月29日,在北京出版集团公司、江苏省作协、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人民文学杂志社为《六人晚餐》举办的研讨会上,评论家们提及最多的是小说精益求精的语言、别出心裁的结构,以及对人性的细微洞察。谈到自己的新作,鲁敏说,这是一份献给爱和残缺的“晚餐”,为社会上所谓“失败的大多数”而写,“这是文学应该到达的角落,也是我致力到达的地方”。

记者:您大概是一个“梵高迷”。6年前为了他的一幅《邮递员罗林》,您写了一部短篇小说《致邮差的情书》,主人公罗林在您的笔下化作一位生活在当下中国的邮递员。而您的新作《六人晚餐》,据说也是从一幅梵高画作——《吃土豆的人》中得来的灵感。一幅百年前的画作,以及一部反映当下人们生存状态的小说,它们之间的联系是什么?

鲁敏:灵感有时候不讲道理,在某种特殊情境的触动之下也就来了,但静下来细想一下,也不是偶然。这幅梵高画作是家人们在灯下晚餐,色泽黯淡,人物表情拘谨而关切——令我心有呼应。这个场景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度,都在永远地进行和发生着,虽然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场景,却蕴含着无数值得放大和深究的密码与信息,深藏有世事的起伏进程、个体的上升或下沉、聚散离合等。世界上所有的晚餐在要素构成上大同小异,无非是食物与一盏灯、几个人,但每张餐桌上的氛围、前因后果、来路去程、所苦所思却大相径庭。

从这个角度上看,梵高的《吃土豆的人》、冯内古特的《冠军的早餐》或是我的这本《六人晚餐》,都是如此。每一顿餐食都是平常的,也都是意味深长的,一个细节就可透露出不同地域不同人群的境遇与生存况味。

记者:《六人晚餐》的情节并没有太多戏剧化的冲突,却给人一种饱满、有回味的阅读感受。您曾提到书中那次“十字街爆炸”,源于现实中一场与您擦肩而过的真实爆炸,这次突发事件似乎带给您很多思考,也直接促成了《六人晚餐》创作过程中的大修改。

鲁敏:我这个小说从2009年4月开始写,时断时续,进展缓慢,中间又穿插有孩子升学、到德国讲学、家人患病等,初稿写到14万字,停下来,觉得不满意。2010年7月,我所居住的南京发生了一次“著名”的化工管道大爆炸,因为离得近,我家也受到影响。回去打扫碎玻璃时,我产生了一个幻觉,好像听到整个城市里的人们都在唰唰唰地挥动笤帚。我强烈地预感到,我的小说里、那个分布有诸多化工厂的郊区,也会发生一次爆炸,书中六个人的命运将要因此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中断了的小说由此获得转折的力量。

我们都知道,这样的大爆炸从来就不是偶发与孤立的,它是后工业时代的一个衍生物,也可以说是近20年城市快速发展后产业转型期的一个踉跄背影。一直到现在,大爆炸依然从各个工地上轰然响起,从被遗弃的化工区响起,从迷宫般的管道深处响起,伴随着黑红色的瑰丽云烟,许多人在那些瞬间永远失去了他们的晚餐。

记者:这部新作描写了人们面对梦想与命运的无

奈和挣扎。这样一个关于“纠结”的主题,很多人都写过,而您的作品给人留下了尤其深刻的印象。大家说得比较多的一点是书中独特的结构。有人称您的《六人晚餐》的结构像“六扇门”、“六棱镜”、“立体魔方”,以不断跳跃、闪回的时间轴,用六位主人公的视角画出底层生活的“浮世绘”。您是怎样酝酿这样一个有创意的叙事结构的?

鲁敏:说来这个酝酿过程真是一个“自我折腾、自找麻烦”的过程。原稿在写到五分之三时,都还是传统的全知全能视角,并且是按时间的先后顺序一路写下来。但回头审视时,突然感到一种厌倦与不满意。小说中每一个人,都是那样的孤独、隔阂而又充满热烈的幻想,我的视角不该全知全能,那样太简单也太冷淡了。我必须全心全意地化身为书中的人物,从他(她)的身影里出发,成为一个局限的、被蒙蔽的人,我们要一起在暴雨中淋个透。由此,我决心推翻、打乱重来,以表面上的第三人称、从每一个人物的个体视角分为六个篇章,不同的事件、情节、因果由不同的叙述主体去承担推进与展开的任务。

同时,在六人视角外,我还随时加入画外音,一个即兴展开评论与感慨的叙述者之声——这是我一直以来的写作特点,以前在中短篇里就有多次尝试,这次继续毫无保留地加以放大。我一直认为,写作手法永无定式,需要各种现代性的打破与加入,需要强烈风格化的尝试与发挥。

此外,这个六人视角恰好还解决了小说里的时间轴问题。《六人晚餐》前后跨度近20年,简单的顺序或倒序都不足为奇,也是对难度的放弃。而通过六个人物的视角就可打乱这种固有的模式,叙事可以在不同的时间节点上进行跳出、闪回、插入、展望与回忆,形成一种自由而曲折的命运感——当然,这个在写作中是相当困难的,我前后六稿,有一半的工夫就是在时间轴与人物视角上折腾、取舍和覆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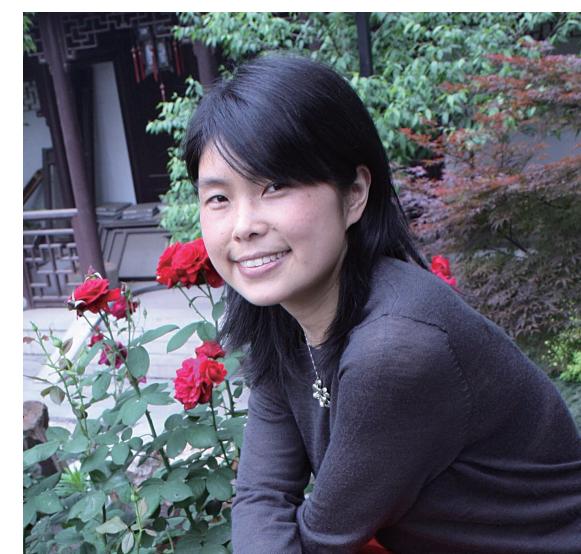
说到底,技术上的拿易求难不仅是对自己能力的挑战,其实也是对长篇这一体裁应有的敬重。很高兴我的这次尝试得到了肯定。我相信,更多的读者会在《六人晚餐》的阅读中感受到一种智力上的愉悦。

记者:中短篇小说一直是您的强项,这次的《六人晚餐》,也有评论家认为从书名到故事含量都有中篇的味道,您如何看待这样的观点?

鲁敏:哈哈,我早预料到会有这样的观点!我其实也懂得“周全”、“稳妥”的长篇策略,包括出版社多次建议过,换上一个“鸿篇巨制”的名字什么的。但是,什么书名更“像”长篇?《爱玛》《高老头》《卡拉马佐夫兄弟》这样庄重的“人名”就像?而《一个人的好天气》《周末》《罗杰教授的版本》《三个六月》这些就不大像?再说到故事,《邮差总按两遍门铃》《我的米海尔》是否也会因为不够复杂而更“像”一个中篇?一个作品是平庸还是优秀,跟这些并无关系。

在我们的长篇样本里,跨度巨大、人物众多、故事复杂的优秀作品,其存量已经足够丰富,也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即使从生态种类讲,我也情愿“不走寻常路”,为其增添一些现代性的品种。小说是一门古老的艺术,却也是不断爆发新鲜力量的艺术。我希望能够成为这样一种力量,这是我一直以来的小小追求,能做到什么程度是另一个问题,但我要求自己这样。

同时,每个作家都有自己对小说的理解与理想,并在寻找着最适合自己的路径与样式。沙雕很大,微雕很小,各有其不可替代的美,从来就没有轻重好坏之分。归根结底,还是要独立地看作品本身。总之,我不意外《六人晚餐》所带来的审美意外。我想我们的小说



需要更多这样的意外。

记者:您曾说自己是从期刊成长起来的一代“70后”作家,对文学的感受很复杂。“70后”作家在您看来是怎样的一个群体?您认为这一代作家在成长道路上面临的主要问题或挑战是什么?

鲁敏:关于“70后”的话题已经被谈得足够多,表面上好像有点儿不幸:写作履历平淡,才华不得张扬,既不如上一辈享受过文学大热的荣光,也不如后来者火速赢得市场碰头彩,像是身处冷水域与暖水域的交汇处——此处,营养最为丰富,命运也最为叵测,搞不好会在中途沮丧至死,或许会顺流而下远离航道。但我坚信,优秀者正可以将势就势、回到文学深处,真正做得好了,一定会是强健有力的。

关于这一代的问题,肯定有,可能问题还不少。但这一点不可怕,因为每一代、每一个个体都会面临着各自的局限性,但艺术尤其是文学就是一个不断与弱点、困境和局限作斗争的过程,重点在于,我们在写作中有没有明确的自觉意识,有没有逆流而上的能力和勇气。

记者:有评论家认为“70后”作家的个人记忆和前辈相比呈“碎片化”,格局偏小,鼓励他们“往大气象走”,多多着眼于大的时代场景。也有评论家表示“个人经验中同样包括公共经验,时代与历史就在每个人意识深处”,不用刻意靠近“大历史”。您个人认为小说应如何面对时代和人心?

鲁敏:个人经验与公共经验、私人记忆与大格局大历史,这是理论界的重要命题。作为一个写作者,我真说不出什么的。

从我的阅读体验来看,小说最终所呈现的,都是取之于时间大河的“小我”及其周遭环境的样本,即人物与环境。《红楼梦》《西厢记》《呼啸山庄》《华生医生的房子》《追风筝的人》,在当时当地,就是一个一个的个体体验,讲述相关一些人的关系、进程与命运。可以想见,在同一时代,还会有各种其他的样本,通过千百年的阅读与传播,不断地淘汰、沉淀,有的作品很快消失了,有的最终留下来,成为文学中“这一个”,具有了“时代和人心”。另一方面,我们也能看到,也有一些“公共代表性”、“历史时代感”极强的作品,在当时名声大振,时过境迁却又不足为道,这样的例子,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有很多——能否代表“时代与人心”,似乎不是立刻就有结果的事。时间会是最好的试金石。

总之,目前就我来说,就是在写作阶段尽我所能,努力提供“人物与环境”的样本,把我所在的世界的位置、我与世界的关系、我对世界的思考呈现出来。

记者:《六人晚餐》是您潜心创作3年的作品,那么下一步有什么创作计划?

鲁敏:左三年,右三年。嘿嘿,又要等一阵了,目前还处在调整与酝酿阶段。可以确定的是下一个长篇还是当下的题材。

梁晓声访谈将在凤凰卫视《名人面对面》播出

中国作协与凤凰卫视《名人面对面》栏目合作,制作了作家、编剧梁晓声的访谈节目。播出时间为2012年7月8日(周日)晚20:30。届时,梁晓声将从电视剧《知青》说起,回忆青春岁月中文学的力量,并畅谈文学在当下的影响。(创 研)